

中原学术文库·学者丛书

治理体系现代化 与反腐倡廉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ADVOCATING INTEGRITY

万银锋
著

海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原学术文库·学者丛书

治理体系现代化 与反腐倡廉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ADVOCATING INTEGRITY

万
银
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反腐倡廉 / 万银锋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201 - 0292 - 6

I. ①治… II. ①万… III. ①社会主义民主 - 研究 -
中国 ②反腐倡廉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2 ②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7223 号

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反腐倡廉

著 者 / 万银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丁 凡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与发展出版中心(010)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292 - 6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腐败，即腐烂败坏。《史记》（卷三十）载有“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后引申过来比喻社会政治现象中的败坏和堕落。现代社会所说的腐败，主要是指政党或国家机构的一级组织、党员或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构任命的其他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党纪政纪，违犯国家法律，侵犯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并造成严重社会后果或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其本质特征是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

可见，腐败与权力与生俱来、相伴而生，成为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但是，腐败的产生根源和发生机理，在不同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下各不相同。封建传统社会的腐败是专制主义制度和私有制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产物，我国封建社会体制性败坏使每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能跳过历史的“周期律”，并最终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孕育发展中，被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所“革命”。虽然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在体制上比传统封建社会要完善得多，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使整个社会处于政党分肥和利益争夺之中，腐败滋生蔓延的制度性根源很深，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处于腐败的纠缠之中。

无产阶级政党其自身的先进性、阶级性和人民性，决定了它与腐败现象的根本对立，并始终把清除腐败作为一项根本的执政使命。但是，20世纪末苏东共产党的垮台、柏林墙的倒塌却给我们提出了警示。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有其先天的优越性，但并没有后天的免疫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其“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

脱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 要消除“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然而，世界现代化历史充分表明，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不仅要进行观念上的彻底革命，而且还要实施体制上的深刻变革。在这场革命和改革中，必然要经过新旧观念、新旧体制的摩擦和衔接，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缺陷和漏洞，给腐败的滋生留下可乘之机。

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腐败，我们不可能因噎废食，退到传统社会里去。只有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反腐败寓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之中，才能不断克服腐败产生的制度性、体制性根源，走出一条既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能夺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有效路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一是建立健全现代化民主治理体系是一个自觉克服腐败的过程。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权力的主体。只有不断深化民主治理体系改革，全面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不断完善民主授权、用权和监督权机制，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才能使权力不会或不敢任性，腐败产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二是建立健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自觉克服腐败的过程。“市场是天然的平等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不仅物质“短缺型”腐败会自生自灭，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自身的法治性、平等性、竞争性将得到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市场自我配置、调节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就会自觉克服权力干预市场的“寻租”现象以及一些不正当市场竞争现象。

三是建立健全现代化教育引领体系是一个自觉克服腐败的过程。着重从思想上进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注重文化引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建设以思想道德文化为核心的教育引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304页。

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内心形成廉洁自律的思想道德防线；必然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从思想上解决“不想腐”腐败问题。

四是建立健全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自觉克服腐败的过程。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与腐败等丑恶现象做斗争的过程。深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必然降低全社会对于腐败现象的容忍度，必然更好地发挥各种社会监督力量的作用，必然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实现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构建全方位反腐的社会治理体系。

五是建立健全现代化法治体系是一个自觉克服腐败的过程。法治是现代民主、平等、公开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了重要部署。社会主义法治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不仅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政府走上“法本位”，而且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和发挥，确保一切权力行为在秩序的框架内运行，确保一切权力腐败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法律惩处。

六是建立健全从严治党的治理体系是一个自觉克服腐败的过程。政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与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决定，只有先在政党治理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将党自身治理的经验和成效拓展到国家治理领域，并为国家治理提供思想理论、精神动力的支持；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解决好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政党治理中破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周期律”	1
第一节 中国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与王朝兴衰	2
第二节 封建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的腐败与反腐败	10
第三节 关于中国千年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思索	19
第二章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改旗易帜的教训	31
第一节 苏东共产党管党治党出现重大偏差	31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严重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	40
第三节 腐败现象盛行成为苏东国家改革的最大阻力	47
第四节 苏东教训给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镜鉴	50
第三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59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产党人的执政使命	59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71
第三节 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题中之义	78
第四章 寓反腐倡廉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之中	93
第一节 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	93
第二节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现象产生及其治理	102
第三节 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110

第五章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124
第一节 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反腐倡廉建设	125
第二节 权力与市场纠结是腐败产生的主要因素	135
第三节 铲除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141
第六章 在现代化民主治理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153
第一节 现代化民主是治理腐败的利器	154
第二节 公共权力制约不力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	161
第三节 建立健全以制约权力为中心的反腐体系	172
第七章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179
第一节 全面依法治国与反腐倡廉建设	179
第二节 现代法治不张是权力腐败的重要根源	190
第三节 构建以约权为核心的反腐败法治体系	198
第八章 在思想文化创新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09
第一节 思想文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209
第二节 腐败滋生蔓延的思想文化根源分析	218
第三节 牢牢坚守反腐倡廉的思想文化阵地	227
第九章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38
第一节 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反腐倡廉建设	238
第二节 当前腐败滋生蔓延的社会机理分析	248
第三节 构建全社会参与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	255
第十章 在现代政党治理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69
第一节 政党治理现代化与反腐倡廉建设	269
第二节 现代政党治理视角下腐败的根源分析	283
第三节 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反腐倡廉建设	289
参考文献	303
后 记	308

第一章

中国千年封建专制的 历史“周期律”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其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认为二十四史既是一部贪污史也是一部反贪污的历史。从前 221 年秦王朝建立到 1912 年清王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先后存在过 62 个政权王朝，更替周期长短不一，长则数百年，短则数十年甚至十数年即可完成一个轮回。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历史、王朝政权的兴起与衰落，腐败与王朝更迭存在较高度度的因果关系。“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隋炀帝从他父亲隋文帝手里接过皇位时，全国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他开始也想有所作为，重建西域交通，修驰道，筑长城，开通大运河，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他役使民力过度，再加上他穷奢极欲，纵情声色，造成百姓苦不堪言，只能揭竿而起，最后他被迫自缢于江都。……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头脑比较清醒，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改革吏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但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迷恋杨玉环，不仅‘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且让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集大权于一身，为非作歹，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搜刮欺压百姓，安禄山以‘奉命讨伐杨国忠’为名反唐，引发‘安史之乱’，唐王朝也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这方面的例子

还有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是走从得民心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①

第一节 中国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与王朝兴衰

封建专制政体是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公元前11世纪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正式形成。建立在封建专制政体上的专制国家犹如一座高大的金字塔，封建帝王就高踞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以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他的臣民。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专制“塔尖”的封建帝王，之后经过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演进，再加上儒家、法家、阴阳家等各个学派学说的“武装”，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日臻完备，一直沿袭达两千余年之久。

封建专制政治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政治体系发展还不完备的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国家权力的集中，特别是分散的自然经济，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保障其发展。只有在集权的国家中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社会劳动，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调节社会的分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维护和促进民族的统一和融合，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等。但是，以集权、特权、专权为突出特征的专制政治，并没有换来长治久安，也没有让封建帝王及其王权恒久地“万岁”，而是沿着从集权到专权、从专权到专横的怪圈，每一个封建王朝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我们在扼腕长叹之余，沿着现代民主政治这条国家治理的“法线”，不难找到封建专制王朝覆灭的原因。

一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下的集权与专权

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民主政治体制）相对立，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汇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

^①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474~475页。

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建立在专制主义基础上的皇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演进中，王朝更替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李氏天下”转换为“赵氏天下”，皇权旁落异姓是朝代更替的重要标志。所以，封建社会的统治模式是“家天下”，皇帝如同一家之长——一人政治、高度集权。

1. 统治体系合法性遭受着质疑和冲撞

皇权多以征服和篡夺而得，封建皇帝必然面临着自己的政权随时又被人夺取的可能。其本能的反应是人人不可信、不可靠，进而以天下为敌。聪明的专制统治者，往往能在夺取天下时利用有才能的人为之竭忠尽智，一旦取得政权就会“狡兔死，走狗烹”，诸如刘邦、朱元璋；愚蠢的专制统治者，往往天下未定就急不可待地杀起功臣来，诸如洪秀全。这就形成一种汰优选劣的机制，造成庸者在位、能者罢黜，加速了政治腐败，成为专制体制先天性无法自愈的脓疮。

天下被一家夺得、为一家所有，因此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成为封建吏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专制的皇帝往往认为同姓的宗室比外姓的大臣可靠，因而封赏近亲以固江山。然而，分封制并没有带来皇室的安宁，宗室反叛、骨肉成仇者，时有所见。西晋的八王之乱，明代的靖难之役，即为其例。专制皇帝并不完全倚仗宗亲，对外姓大臣也是既用之又百般猜忌，怕他们有不臣之心。为维护庞大的金字塔结构的专制统治，封建皇帝只得添设平衡、牵制、监控、告密、刺探等机构。于是，越设越多，官员越增越多，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与重叠的官僚机构。在这种结构和态势下，为维护各自的官位、爵禄，各级官吏“依葫芦画瓢”，搞起了任人唯亲的裙带之风。由此形成的吏制之网，难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关系网”的永固，“裙带”之间相互支援，相互包庇，遮天蔽日，无所不为。这种由皇帝而至各级官吏的裙带之风的恶性膨胀，使权力阶层始终处于权力和利益争夺之中，最终使王朝坠入不可救药的地步。

这种体制的先天“不足”，不可避免地派生出诸多的矛盾与危机。其一，王权的接替逐步发展到嫡长子继承。无论继承人何等昏庸无能、年幼无知，甚至近乎痴呆也是皇位的当然合法继承者。这一规则，侧面映射出

皇权政治的庸俗和腐朽，进而泯灭了政治参与者的热情。其二，一人、一姓之天下，非通过人民公决的选举方式产生，且据以为私、代代相传。但这使一些人萌生不满诸如项羽“彼可取而代之”，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知不觉地诱发了人人想做皇帝的念头，导致中国历史上叛乱谋权的战火频仍，民生涂炭。其三，依靠宗法制度皇权世袭，如双手递物，很容易使继承者不知“马背之苦”，难晓“稼穡之艰”，把权力作为“传家宝”肆意把玩，为所欲为，甚至走向专横跋扈，更不用说惜民爱农和躬行勤俭了。

2. 专制主义统治基础时刻发生着动摇

我国封建专制体制自“禹传子、家天下”以来，无论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一人、一姓之天下。为了巩固皇帝专制，在地方施行郡县制度，在中央施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官和中央官一律由皇帝任命。汉承秦制，使这种专制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至清朝军机处的设立，独裁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康熙皇帝曾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在皇帝独裁、君主专制的政治氛围下，所有臣民被剥夺了政治自由，即使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毫无民主可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这一体制的先天缺陷，决定了封建专制王朝无论皇帝多么英明，最终都无法摆脱存亡危机。

在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位于统治阶级的核心和整个社会的中心，皇帝的善恶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在那里，法律不仅反映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体现皇帝的个人意志、由皇帝所定，成为皇帝驾驭臣民的工具；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一个成文法颁发后，皇帝不仅言行不受法律的约束，而且在行使权力时还有可能会破坏成文法。臣下对于皇帝的过错只能劝谏，不能通过法律来约束和规制。以历史上的隋炀帝为例，他不惜以举国之力开凿运河，组织群臣、亲友等庞大的队伍到江南巡游，其劳民伤财、纵情声色、荒废朝政之程度可想而知。当隋炀帝第一次准备南下江都游玩时，建节尉任宗上书劝谏，则被杖死在朝堂之上；正式出发时，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谏阻，先被剖面，后被斩首；走到汜水时，另一个奉信郎王爱仁上表请还西京，又被活活斩杀；当船队到

达梁都时，又有人拦路上书劝阻，同样遭到残酷杀戮。隋炀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使得“黄河以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①。隋炀帝一生为了追求逸乐，不惜极力拒谏，三下江南，享尽人间富贵，最后被叛军缢死江都，隋王朝由此而败，亡于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之中。

3. 不受监督的皇权无时不在放大

我国封建社会皇权是不受实质性监督的，自上而下都是权力与受监督程度成反比，即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约束程度越低，抵御社会监督的能力也越强；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任何监督都不能强制。因此，皇帝不仅具有拒绝监督的能力，而且得到社会监督的机会几乎为零。皇帝的好坏与善恶很大程度由他本人的品质好坏与心理的健全来决定，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繁荣，则由皇帝本人的素质决定。虽然每个王朝都构建了专门向皇帝进谏的谏官制度，但这个制度在皇权专制之下，其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好恶。唐太宗虽然因能够纳谏而成为后世赞颂的明君，但他也只不过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一个特殊的典型。君主护短拒谏、大臣死于劝谏者历代皆有。事实上封建皇帝都存在拒谏饰非的行为，有的甚至对进谏的大臣施以重刑。即使同一个皇帝在不同时期，对待谏言也有不同的态度。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就是最好的典型，从最初的“察纳雅言”，一直发展到逐贤任奸、宠信佞臣，自己写下了唐朝由盛至衰的长恨悲歌。

二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下的官僚政风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中，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不可能包揽一切政治活动，必须借助官僚队伍和官僚机构的力量，实行统治。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伴生物。在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官僚的最高领导，在他之下的各级士大夫官僚，类似于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统治人民的“小皇帝”。官僚士大夫借圣人之言，创立朝仪、制作律令，帮助皇帝把绝对支配权建立起来，而他们就好像围绕在鲨鱼周围

^① 魏徵等撰《隋书·炀帝本纪》，中华书局，1973，第206页。

的小鱼，靠鲨鱼的分泌物而生活。帝王的权力越神圣、越牢固，他们的“小皇帝”地位也就越不可侵犯和动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士大夫，本质上部分地分享着皇帝的绝对支配权。

受封建专制皇权的荫蔽，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发展系统而完备，突出表现之一是官僚队伍的庞大。同时，官僚政治带来各层级权力腐败，也时无不在挖掘着皇权的“墙角”，特别是各级官僚把管理服务社会的权力异化成对社会进行盘剥的权力。由此，权力逐渐成为各级官僚谋取私利的主要工具，国家权力与私人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官场成为追逐私人利益的场所。有权者依权得势、无权者傍权得势，权势成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砝码，使封建社会官场政风腐化，同时也引发了整个社会风气一定程度的败坏。

1. 官僚体系的穷奢极欲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士大夫往往利用地位和权力敲诈勒索、贪污贿赂，似乎成为专制制度中一种无法根除的政治现象。这种情况往往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和皇室开始，呈“发散状”蔓延，自上而下波及整个官僚集团。即使偶有皇帝从前朝的教训和夺取江山的艰难中悟出点什么，统治之初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惜民爱民，但他们统治的后期或他们的继袭者，绝大多数逐渐忘记根本，最后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形成整个官僚阶层穷奢极欲之风。大明朝就是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提倡简朴，全朝各级官僚的生活也较为节俭，士大夫一般不允许置办家产，谋取私利的贪官往往不为士伦所容。但到了明嘉靖、万历年间，官员们开始对奢侈生活的追逐。以交通工具为例，明初京官们上朝办公多为步行，地方官到任亦多无骑马，更多的是骑驴“报道”。但到了明嘉靖年间不仅官员没有再步行上朝的，就连驴马等也全部不用而只用轿子代步，就连离职家居的官员、举人、监生、秀才、官员的子弟，也无不乘轿而行。

2. 价值观念的普遍扭曲

人们从官僚阶层的行为中感受到官方所正式提倡的那些伦理观念的无用和虚幻，因而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一种与官僚阶层腐败行为和言论相一致的以谋求私利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观念首先从官僚们的身上表现出来，许多官僚把仕途当作权钱交易的筹码。正如顾炎武所言，各级官员

“自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金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获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①“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银，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字阁人之手。今则亲自呈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此物。”^②官场上追逐名利、寡廉鲜耻，社会上也为了追逐金钱而不讲什么道德伦理，人伦纲常遭到破坏，长幼失序、尊卑倒置。从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来看，价值观念的扭曲往往从官僚阶层开始，最后殃及官风、政风和民风，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衰败、统治系统崩溃。

3. 社会风气的消极颓废

荒淫颓废是引发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极具破坏力的风气，往往是从皇帝及权贵们开始兴起，而后至于官吏和地主及商人之中，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的颓废与堕落。历史上封建皇室中的淫乱现象不绝于书，有母子通奸、叔嫂通奸和兄弟姐妹淫乱等现象。有的皇帝奢侈淫逸并不满足于三宫六院，甚至还走马灯一样更换宫女。比如晋武帝司马炎后宫人数达万人，但为了选纳宫女他还要禁止全国婚嫁。皇帝如此，王公大臣们也都争相效仿，上演了“红颜祸国”的历史闹剧。不仅如此，娼妓业因之得以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为例，尽管政府也禁止官员出入妓院，但官宦、乡绅、读书士子、地主商贾间的交往，往往以相约于歌楼酒馆为时尚，以嫖娼宿妓为享受。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记载南京、杭州妓业的情形：“街上有妓女，人数之多，简直使我不敢冒昧出来。……在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她们的踪迹。她们浓妆艳服，香气袭人，住在陈设华丽的住所，还有许多女仆，跟随左右。这种女人，拉客的手段十分高明，献媚卖俏，施展千媚百态，去迎合嫖客的心理。”^③封建官僚阶层的荒淫与颓废恶化了社会风气，加剧了不同朝代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一些暴力抗争事件与农民起义成为封建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① 白钢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05页。

② 白钢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13页。

③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179页。

三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下的精神枷锁

任何阶级或集团实行社会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思想上的统治，即努力使民众接受或认可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理念、意志或主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主义紧密相连，要加强和稳固政治专制，途径之一即实现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我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王朝，无一不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统治。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清朝的文字狱等，严格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大大加深了封建专制程度。

1. 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

自秦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体系确立以来，任何朝代的皇帝无不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皇权。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程度的不断加深，意识形态的严酷控制日益加强，并在某些朝代或某些帝王的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最突出的形式就是“以文罪人”。从秦朝“焚书坑儒”中 465 个儒生方士的桀运，到清朝时期“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带来的飞天横祸，以文罪人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道暗迹。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时期最大的一场文化暴政，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开创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以文罪人的“先河”。明清时期，文化专制达到了顶峰。朱元璋出身低微，忌惮于士林的讥讽而殃及一些读书人，及至朱棣年间甚至因此祸及文人的全部家族。清代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竟连续制造了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

这种文化专制还表现为日益强烈的愚士政策。科举是读书求仕的唯一途径，科举考试是一根极有权威的指挥棒，天下的读书人不得不一生围着它团团转。“刘项原本不读书”，中国历史上但凡登上帝王宝座的，没有几个是通过科举选出的读书人。但每个专制王朝的存续又绝对离不开读书人，无论哪个朝代都能感受到学问的力量，于是读书人被赶进了读圣贤书、写八股文的科举考试死胡同。读书人变成“君臣大义”的附庸，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以明朝为例，八股取士是选拔官吏一直沿用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明朝统治者就是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

子思想。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为了做官而局限于四书五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通过文化牵制的科举取士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控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维护。

从以文罪人到八股取士，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这种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以文罪人的文化暴政为手段，一定程度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文化发展，造成整个社会暮气沉沉，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覆灭。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暴虐、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以及当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加强了专制；清朝文字狱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创新。从上述封建专制主义下的文化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思想的统一，只会禁锢思想，摧残学术文化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可以说，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对思想文化的摧残，才加速了不同朝代的灭亡。

2. 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迷信

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特别注重利用民众的政治迷信来加强其统治。社会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等都建立在政治迷信的基础上，其根本目的就是使整个社会处于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之中。“更令中国人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之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①。只有民众跪伏于皇权，皇权显得至高无上，封建专制统治才可能稳固。

“君权神授”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绝对统治权威的法宝。帝王受权于天，代表上帝的意志。帝王之所以贵为“天子”，并不仅仅具有超人的才情，而且与天地有着密切的联系，臣民必须尊崇于皇权。秦汉以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发展，忠君思想使得满朝上下都必须遵行其政治规范。所谓“立天子以父天下”、“役天下以奉天子”^②的一人独尊而万姓仰止的政治格局牢不可破。在神秘的皇权专制之下，君主受天下人特殊的敬畏，国家成为帝王个人的“私产”，拥有无上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君权被神化、皇权被私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民众政治能动性的

^① 《鲁迅文集》，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第100页。

^② 《逸民列传·江阴父老》，《后汉书》，线装书局，2010，第2067页。